

外教社翻译研究丛书

Translatology

— A Constructivist Perspective
of Translation Study

翻 译 学

—— 一个建构主义的视角

吕俊 侯向群 著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外教社

外教社翻译研究丛书

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十五”规划基金项目

Translatology

—— A Constructivist Perspective of Translation Study

翻 译 学

—— 一个建构主义的视角

吕俊 侯向群 著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翻译学——一个建构主义的视角/吕俊,侯向群著.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

(外教社翻译研究丛书)

ISBN 7-81095-837-2

I. 翻… II. ①吕… ②侯… III. 翻译理论 IV. H59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13569 号

出版发行: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上海外国语大学内) 邮编: 200083

电 话: 021-65425300 (总机)

电子邮箱: bookinfo@sflep.com.cn

网 址: <http://www.sflep.com.cn> <http://www.sflep.com>

责任编辑: 邵海华

印 刷: 常熟市华顺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开 本: 890×1240 1/32 印张 9.625 字数 292千字

版 次: 2006年7月第1版 2006年7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5 000 册

书 号: ISBN 7-81095-837-2 / H · 326

定 价: 17.00 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本社调换

“外教社翻译研究丛书”编委会

(按姓氏笔划为序)

顾问:

王宗炎 (中山大学)

刘重德 (湖南师范大学)

主任委员:

庄智象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杨自俭 (中国海洋大学)

黄国文 (中山大学)

委员:

王克非 (北京外国语大学)

冯庆华 (上海外国语大学)

申 丹 (北京大学)

刘士聪 (南开大学)

吕 俊 (南京师范大学)

朱志瑜 (香港理工大学)

许 钧 (南京大学)

张佩瑶 (香港浸会大学)

张美芳 (澳门大学)

汪义群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罗选民 (清华大学)

郭建中 (浙江大学)

郭著章 (武汉大学)

廖七一 (四川外国语学院)

谭载喜 (深圳大学)



总 序

翻译研究是不是一个学科,翻译有没有“学”,现在不应该再费时论争了。董秋斯 1951 年就提出要建立翻译学,要写出两部大书,一部是《中国翻译史》,另一部是《中国翻译学》。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和安德列·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在为《翻译研究丛书》写的总序中第一句就宣称:“The growth of Translation Studies as a separate discipline is a success story of the 1980s.”(1993) 我国 1979 年就开始招收翻译专业的硕士研究生,1986 年国务院学位办公布了首批“翻译理论与实践”(二级学科)的硕士点,现在已有一大批以翻译研究为学术方向的硕士生和博士生,1989 年以来,国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都陆续设立了一些翻译研究项目,1992 年国家技术监督局发布《学科分类与代码》,把翻译学正式定为语言学(一级学科)中应用语言学(二级学科)之下的一个三级学科。虽然这个学科定位还不够科学,但这个学科的存在已被公认。这说明学科的产生和发展不是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它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类认识水平的提高而产生和发展的。

近 20 年来,这个领域的国内外学者都在努力加大研究力度,拓展研究领域,深化研究层次,陆续出版了不少翻译学研究的新成果。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为满足国内翻译教学的需求和推动这个学科的发展,经过精心选择,引进了一套“国外翻译研究丛书”(现已出版 29 种),这在我国翻译界还是第一次。这套丛书在翻译教学和研究中已经并将继续发挥它的重要参考和借鉴作用。



但是引进与借鉴不是目的,我们的目的是结合我们自己的翻译研究和教学实践进行新的创造。怎样创造?许多学科的发展史证明,要创造就要中外结合。怎么结合?中国学术史告诉我们,要结合就要以自己的研究为根基,以国外的研究为参照,借鉴其理论与方法,改造和创立基本范畴,建立新的范畴系统。这个以自己为主的中外结合的原则就是学科建设的方针,也是我国翻译研究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对一个学科的发展来说,引进国外的理论和方法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结合我们的翻译实践、翻译教学与研究,写出与我们自己的实际密切结合的论著。国内已经出版了一些这样的著作,对翻译学的建设起到了某种程度的推进作用,功不可没。但从理论的系统性和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上来说,我们还没有一本多数人认可的《翻译学导论》。此外,在中国传统译论的继承性研究、外国译论的借鉴性研究、翻译实践(包括翻译教学实践)中新问题的探索性研究、相关学科(如文化、心理学、语言学、文学、社会学、哲学等)的吸融性研究以及方法论的多层次研究(包括本学科的和相关学科的)等几个重要领域,也都缺乏高水平的系统研究的论著。

为了进一步推动翻译学的研究与发展,满足这个学科研究生教育的教学与研究的需求,我们特别组织国内专家撰写以翻译学学科本体研究为主的系统的理论性论著——“外教社翻译研究丛书”。在筹划此套丛书时,我们了解到中山大学“985”学科建设项目也正组织编写“中山大学翻译研究丛书”,我们很高兴把他们的这些选题纳入到“外教社翻译研究丛书”中来。本丛书是一个开放性的系列,我们撰写、约稿的原则是:(1)作为翻译研究类的学术专著,应充分反映本领域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2)追求理论的系统性和学术观念与研究方法的创新性,目的是对翻译学的发展和翻译人才的培养起重要的推动作用;(3)用汉语撰写。读者为高等学校翻译以及其他相关专业的教师、研究生,翻译学界、语言学界以及文学、文化、哲学与心理学等学界的翻译工作者和爱好者。

翻译是人类跨语言跨文化的交流活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最重要的手段和途径之一。I·A·理查兹(Ivor Armstrong Richards)曾说,翻译很可能是宇宙进化过程中产生的人类最复杂的一类活动。



它的复杂性必然对我们的研究构成挑战,要求我们的研究不断拓展,不断创新,不断深化。从古至今,大体说来,人类对翻译的研究已有了直观经验式的、文艺学的、语言学的、文化学的等多种视角和方法。我们相信,我国的学者一定会同世界各国的同行一道,对人类这项重要而复杂的活动不断加以探索,进行多层面多角度的研究,为这一学科的发展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外教社翻译研究丛书”编委会

3

总
序



外教社翻译研究丛书——翻译学——一个建构主义的视角

译学探索之路

——《翻译学——一个建构主义的视角》序

这几年我读了不少学友的书稿,也写了一些序文,从中学到许多知识和治学之道,也借题发挥思考并提出了一些为人为学的看法,都算遵命完成了任务,没犯很大的难。去年吕俊同志让我读他与侯向群合著的书稿《翻译学——一个建构主义的视角》,提出修改意见并赐序文。老友下令,怎敢怠慢。但这次却不那么顺当,让我真犯了难,也真怠了慢。一是这本书的内容我读了一遍没全懂,于是就打电话请教,老吕除了每次口头回答我的问题之外,还专门写了两篇文章《何为建构主义翻译学》和《论学派与建构主义翻译学》让我学习。他做事认真、治学严谨的态度与精神真让我十分感动。二是我很想借此机会研究他的治学道路,这首先对我,其次对他人会有很多的启迪,因此我就得多花一些时间读他其他的文章和著作,思考、分析和研究他治学的经历和经验。我研究过刘重德先生为人为学的经历、经验和学者品格,受到很深的教育,一部分记录在我那篇短文《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立德垂范》(《上海科技翻译》2003年第2期)之中,一部分深深地沉淀在我的心里,成为我的精神财富。今天研究吕俊就是想从同代人中学到有价值的东西,以利提高我的品格、学养与精神境界。

吕俊和我是同代人,但比我年轻8岁。我们都是解放后读的中小学,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同是1967年)大学毕业,而且都教过中学,我还教过小学。从读中小学到教中小学,这是我们人生的第一个阶段。当时的时代精神、社会文化环境、学校教育和家庭影响给了我们颇有成效的熏陶与教育,我们的这段经历和上下两代人的经历有很大差别。1990年7月我有幸在井冈山英汉比译研讨会上认识了吕俊同



志,他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忠厚、耿直、正派。会后我们同路到南昌,同住一个房间,得以彻夜畅谈,那个难忘的夜晚已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吕俊讲述这段历史是这样表达的:生活比较艰难,书读得不多,社会活动得多,虽然知识学得不丰富也不系统,但培养了事业心与责任感,也培养了爱集体爱祖国的情感和吃苦耐劳的精神。对我们这代人来说这是很重要的一段历史,它起着奠基的作用。我每次和他交谈都能学到很多东西,印象很深的是许多中外名训他都能出口成诵,比如有孔子的“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学而不思则罔”、“知之为之”、孟子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和“富贵不能淫”、老子《道德经》中的“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等那些名段,他特别赞赏司马光《资治通鉴》中那段“以德帅才”的论述和王国维用晏殊、柳永、辛弃疾 3 人词中的妙句集成的关于学业大成必经的 3 种境界。马克思的“*There is no royal road to science ...*”和奥斯特洛夫斯基的“*Man's dearest possession is life.*”这两段宏论警句他至今不忘。他还不止一次地说过恩格斯、列宁、高尔基、别林斯基、爱因斯坦、居里夫人、歌德、培根等大智慧者关于人生、事业、治学、人格、真理、苦乐、成败等问题的警句名言使他终生受惠。我在和他的交往中深深感到,在这个历史阶段他的人生目标、德才观念、进取精神、治学态度、崇高境界等为人学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内化过程已经基本完成,大都已深深地根植于他的心中,就像未出土的竹笋一样,一旦阳春来临,便会破土而出,茁壮成长。说到这里我想起了孔子说的“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这说明 30 岁至 40 岁这段时间在人的一生中何等重要。现在年轻人有许多困惑,常有学生问我如何“成家立业”一类的问题。通过研究吕俊和我们同代人的经历与经验,我深深地感到“家庭幸福事业有成”方为人生完整之目标,缺一则不完美矣。若二者兼得须“立大志,薄名利,愿勤苦,乐吃亏,重诚信,多宽容”,舍此无捷径也。

我 1977 年,他 1979 年进大学任教,但他 1980 年就明确了以翻译研究为专业方向,我 1987 年才开设对比语言学的课程,1989 年才开始教翻译课,起步比他晚了许多,进入角色就更比他迟。进入大学以后,我们这代人面临着两个密切相关的实际问题,一是如何估价自己的学业基础和教学科研能力,二是如何选择确立自己的学术研究领域的主



攻方向。我们今天回头看就更清楚了,在第一个问题上,有的人有估价过高或过低的问题,过高和过低其结果基本一样,就是做不到有目标有计划的补课。由于第一个问题没得以很好解决,所以第二个问题就更难解决。因为学术方向的选择与确定是在深刻认识自己的优势与劣势的基础上逐步落实的。在教学科研的实践中我们都深知所受的教育深广程度都不够,知识结构不合理不系统,有重大缺陷。怎么办?只有靠刻苦学习,有目的有计划地认真补课,没有别的路可走。吕俊这方面做得比我好,他不但英语功底打得好,而且有计划地加强英汉两种语言文化的学养,逐步补缺、构建和优化自己的知识结构。说到这方面的问题我深有感触,古今中外在学术上有成就的人大都有几个共同点:一是立志早志向高,而且知难而进,终生进取;二是较早接受名家及其经典的熏陶和教诲。我们这代人这方面有严重缺陷,基础教育和大学阶段学术环境很差,读书时间少,劳动与社会活动多,更没有机会与可能聆听名家教诲和跟他们交流与切磋。改革开放以后这方面逐步好转。其实我们这个民族并不缺少这种思想,“严师出高徒”和“名师出高徒”的名训几乎家喻户晓,只是我们管教育的人不重视,在教育过程中(特别在基础教育过程中)拿不出切实有效的办法。欧美人可能特别重视这个问题,德国有机化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瓦博格(O. H. Warburg, 1883—1970)说:“一个年轻科学家一生中最重要的是跟他那时代的科学巨人接触。”美国经济学诺贝尔奖获得者赛缪尔森(Paul Samuelson)说:“我可以告诉你们怎样才能获得诺贝尔奖。诀窍之一就是要有名师指点。”三是有正确认识和建设自己的能力。这个能力特别重要,是自我建设最有成效的能力。它包括准确认识自身优势与劣势的能力;选择、确定和调整奋斗目标的能力;有目标有计划补课的能力;协调优化智力结构和非智力结构的能力;选择学术对手(同行竞赛者,是朋友而不是敌手)的能力。四是不断优化知识结构。所谓不断优化了的知识结构逐渐形成三个打通的系统:古今打通,文理打通,中外打通。我们上代学人中赵元任先生就是这样三打通的学者,所以他的贡献就特别多而大。我们这代人中不仅三打通的没有,就是两打通的也极少,甚至一打通我们都没做好。一是时代没提供合适的条件,二是我们自己的努力很不够。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的基础教育中不重视逻辑、语法与修辞这三艺(trivium)的教育(见2000年我给李国南的《辞格与词汇》写的序文),这是我们教育的一大缺陷,严重地影响了创造性人才的培养。这三个学科是培养人的思维、认知、表达能力的学科,这三种能力是人的其他各种能力的核心,是理论思维和创造能力的根基。不说逻辑和语法,单就近期修辞学中 metaphor(隐喻)和 metonymy(换喻,借代)的研究来说,为提高人的认知能力和推动认知科学与认知语言学等学科的发展已经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我再次呼吁,希望更多的学者和教育家都来关注这个三艺教育问题。

读了吕俊同志的文章和各类著作,你不得不承认他是个学问做得比较全面的人,既教翻译又研究翻译,既有微观研究又有宏观研究,既做翻译实践又从事理论研究,既编写教材又撰写理论著作。就他的学术研究所走过的历程大体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这种划分不一定很恰当,但大致可以看出他治学所经历的过程。

(1) 微观研究阶段。他从1983年开始在《翻译通讯》、《现代外语》、《外语学刊》等期刊上发表研究翻译的文章,讨论的问题主要是翻译教学与实践中的局部的或具体的问题。1987年以后逐步关注理论问题,他不仅研究翻译学本体,还研究相关学科和学科理论基础(哲学的、心理学的、语言学和文艺学的),同时他开始用系统科学(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的方法探讨翻译问题。1994年他出版了一本教材《英汉翻译的理论与方法》,这本书既是这个阶段结束的标志,也是下一个阶段开始的标志。刘重德先生在为该书所作的《序》中作了一个很好的总结:“它吸收了近年来国内外翻译界的新成果,如奈达的动态对等,吸收了语言学界的研究成果,如篇章语言学、交际理论,同时也反映了作者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如语段作为翻译单位、语言国情学、语言对比等。总的看来,立论正确,观点新颖,内容丰富,材料详实,从词语到篇章的文体都做了比较系统的探讨,英汉两语的异同也进行了多方面的比较,可以说截至目前为止,在英汉翻译方面,本书是一部体系比较完整的新教科书。”从书中可知翻译学、语言学、符号学、文体学、文艺学以及翻译中的文化因素等理论问题都已进入了吕俊的翻译研究视野并部分地开始了深入探讨。



(2) 理论准备和学科建设思考阶段。这个阶段大体从 1995 年至 20 世纪末。从他发表的论文来看,这个阶段他集中做了三件事:一是研究了诗歌翻译的理论问题;二是学习并用学科学的理论构想翻译学的性质和定位问题;三是为翻译学的建设做相关学科的理论准备,他主要学习研究了西方哲学中语言论转向、西方文论、美学以及传播学等和翻译学的关系问题,找到了这些学科对翻译学建设的支撑点,为下一个阶段用历史和逻辑相结合的方法研究翻译学各类研究模式打下了基础。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很艰难的阶段,因为学懂(不走样)西方的理论就不是件易事,能和我们的实际很好地结合起来就更难。正如吕叔湘先生所说:“‘结合’二字谈何容易,机械地搬用乃至削足适履的事情不是没有发生过。”(龚千炎著《中国语法学》序,语文出版社 1986)

(3) 翻译学范式划分和比较研究阶段。此阶段从 2000 年至 2004 年。他这个阶段的主要成果集中在三个方面。1)《跨越文化障碍——巴比塔的重建》(2001)是理论研究成果的代表作,是在已发表论文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这本书的贡献有三:一是讲清楚了译学研究的三种范式的基本范畴,通过比较、分类与界定让大家明白了其异同和各自的优缺点,为进一步寻找译学建设之路和构成范畴系统提供了参照。二是他在该书的《代前言》中说:“有人说中国的学术界在改革开放后的 20 年中走过了西方半个多世纪甚至一个世纪的历程,这句话并非一种夸张。就翻译界而言,可以说就是如此。我们的翻译研究就经历了语文学研究阶段、结构主义现代语言学阶段、解构主义阶段。”并在书中简要论证了我国译学研究所经历的这三个阶段。不管这个说法准确不准确,但这种关注我们自己建设的做法是值得大力倡导的。因为我们在理论研究上有一种自我轻视的倾向,不少人很愿意紧跟在外国学者的后边做介绍加评点的文章,参考文献全是外文的或是翻译的,有意无意地忽视国内同行的研究,吕叔湘先生批评过这类现象:“我们不能老谈隔壁人家的事情,而不联系自己家里的事情。”(陈平著《现代语言学研究》序,重庆出版社 1989)学习外国的是为了寻找参照系,为了借鉴,而不是目的,用于建设我们自己才是目的。如不这样做不仅影响我们事业的发展,而且自己也难做出真正属于自己的成绩。三是在研究方法上提供了一个历史和逻辑相结合的模式。吕俊



在研究这三种译学范式时,一方面抓住了它们的历史传承关系,探索其发展规律,一方面以译学为中心从学理上研究相关学科在不同历史阶段跟译学的关系,从而纵横结合,把问题说得比较深透。2)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高等院校英语专业研究生系列教材《英汉翻译教程》(2001)是为研究生编写的教材,它以传播学为机体框架把翻译学的内容都归于其中,和过去的教材相比,它不仅扩展了翻译学的研究领域,把翻译全过程分解成本体、主体、客体、载体、环境、效果等要素,而且基本理清了各要素之间的关系。这是借用别的学科理论研究翻译学的一种探索,应该说这也是一种开拓性的研究。3)五本译作出版。1999—2001年间吕俊出版了弗洛伊德文集《释梦》、《马拉默德短篇小说集》、《金色的耶路撒冷》等5本译作。我没读过他的这些翻译作品,无从评说,但至少可以说他在进行理论研究时没有放下翻译实践,可以想见这是在理论指导下的要求更高的翻译实践。这对一个研究翻译理论的学者来说是极其重要的。这三方面的成果特别是理论研究成果是经过不断反思和批判而产生的,特点是比较系统而深刻,这就为进入第四个阶段打下了更宽厚的基础。

(4) 建构主义研究阶段。这个阶段是前一个阶段的继续和发展,主要内容集中在他的《翻译学——一个建构主义的视角》这本新著中。这是翻译学的一个理论框架。我读后印象最深的有以下几个问题:1)以哈贝马斯(Habermas, 1929—)的学说为指导,通过比较和批判说明了语文学、结构主义语言学、解构主义、建构主义四种范式的异同,从哲学基础、理性观、真理观、语言观、认识观等5个方面论证了建构主义翻译学的合理性。这种研究对我们有重要意义,是学科理论建设的主要方法,既找到了深厚的理论基础,又易于使理论的构建具有继承性和系统性。2)以建构主义翻译观为基础,通过比较与批判总结出了建立建构主义翻译学翻译标准的三条原则:知识的客观性;理解的合理性与解释的普遍可接受性;原文文本的定向性。这些原则比较接近翻译的实际,体现了开放性与多元性,也易于实现主观性和客观性相结合。因此按这些原则建立起来的标准,可能会更有效地指导翻译实践和研究。3)借鉴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discussethics)提出了翻译伦理学(translative ethics)。吕俊在书中说:“翻译伦理学的宗旨是



建立跨文化交往活动的行为准则。它是一种以承认文化差异性并尊重异文化为基础,以平等对话为交往原则,以建立良性的不同文化间互动关系为目的的构想。”按照哈贝马斯的普遍语用学(universal pragmatics)和商谈伦理学的思想,翻译伦理学的理论原则首先是追求平等与公正,反对语言和文化霸权主义,反对霸权的和狭隘的各类中心主义。其次不同文化之间要相互尊重,异中求同,取长补短,共同进步。再次,应追求交往活动的有效性。怎么样交往才能有效性高呢?那只有交往各方都追求真善美,别无他法。“真”就是说真事,讲实话,反对各种不同形式的谎言、弄虚作假和以假乱真。“善”就是真诚相待,平等互利,友好交往,反对各种形式的损人利己行为。“美”就是得体,得体有丰富的内容,单就“对话”这种交流来说就有态度、表情、举止、话语、语气、声调、话轮转换、内容调整、结束方式等等。翻译伦理学就是翻译行为和活动的道德规范,也就是不同文化的人们相互交往与交流行为和活动的道德规范,它的核心价值观念是“促进人类的交流和进步,缩减与消解民族之间的矛盾和为此而付出的代价”。(见2004年我给司显柱的《翻译研究:理论、方法、评估》写的序文)这种价值观念就是我们曾经说过的翻译学的深层理念,也就是翻译学的灵魂。在这本新著中除了我说的以上三点还有不少精彩之处,比如翻译学的性质与定位、理论的功能、各种不同文本的关系问题的论述等等,这些问题都留给读者评说吧。

最后还是老办法,借题发挥说点感想。我们这代人和前辈学人相比有很多不同之处。第一,总体来说我们的中外古今语言文化功底,特别是国学功底和前辈相比差距很大。他们很多人都能中外与古今两打通,而且国学功底很深,而我们这代人经史子集知道得太少,单就“集”中的诗、文、词、赋也所知寥寥。当然对西方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莎士比亚、但丁、歌德、罗素、康德、托尔斯泰、洪堡特、黑格尔、汤因比、库恩等人的文史哲经典读得也很不够。这是学问的根基,由于这个根底浅薄,所以我们这代人的学问就受到了严重的制约。第二,在学风和学术道德的严谨程度上我们这辈人比前辈也放松了不少。季羨林先生说:“这样明目张胆的大骗当然是决不允许的。还有些偷偷摸摸的小骗,也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戒心。小骗局花样颇为繁多,举其



莘莘大者,有以下诸种:在课堂上听老师讲课,在公开学术报告中听报告人讲演,平常阅读书刊杂志时读到别人的见解,认为有用或有趣,于是就自己写成文章,不提老师或者讲演者以及作者的名字,仿佛他自己就是首创者,用以欺世盗名。这种例子也不是稀见的。至于有人在谈话中告诉了他一个观点,他也据为己有,这都是没有学术良心或者学术道德的行为。”(《季羡林人生漫笔》,同心出版社 2000 年,第 376 页)当然季先生不是专门批评我们这代人的,但包括我们。学术腐败现在已发展到不可容忍的程度,实在令人焦虑,我们不能熟视无睹。当然这是个很复杂的社会问题。本来学术是相对独立的,相对自由的,也是相对洁净的,但现在权力也走了进来,金钱也钻了进来,关系也挤了进来,这就复杂起来了。科学的精神、态度和方法似乎都成了障碍,因为用它出成绩太慢,绝不如占、买、要、偷一些办法来很快。这样一来科学的尊严和学术的净土就愈来愈少了,可怕呀!我们的态度应是严格要求自己,积极研究根源,理性上加强批判,制度上严格把关。第三,在研究方法上我们这代人大都缺乏考据之功。我们的学术传统讲究考据、辞章和义理,考据是考辨证据,辞章是赋诗作文,义理是理论研究。老一代学者中有的三者或两者集于一身,我们这代人中这样的学者可以说极其难找了。研究学问不论用什么方法,都需要证据,获得证据需要三种工夫:考辨真伪,确定当与不当,选择充分与不充分,这都是极其费时的工夫。我们现在做的学问不少都缺少这些工夫,所以有的文章会曲解古人和洋人的思想,有的研究是微观和宏观分离甚至二者相互否定。第四,由于轻视理论的学术传统的影响和时代的局限,我们的前辈学者对理论研究重视不够,他们大都重视考据,不看重系统的理论研究。他们常用的研究方法是从小处着手,分析入微,层层剥落,最后画龙点睛,得出精言妙论。其基本模式是《易经》上讲的“观物—取象—比类—体道”。我们虽有墨家逻辑,但它重内容轻形式,没形成亚里士多德形式逻辑那样完整而严密的理论体系,因此不具有方法论性质。重技术轻科学的学术模式在先秦时代就形成了,所以我们的传统中还缺少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爱因斯坦(1952)说:“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的,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



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纪念爱因斯坦译文集》,上海科技出版社,1979年,第46页)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国内外的交流,在理论与应用的关系和科学技术的关系以及学术研究模式等重要理论上,我们这代人可能比前辈学者认识得更深刻一些,因此对理论与方法论重视的程度可能更高一些。比如我们对学术研究模式已有了较科学的认识,把归纳法和演绎法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研究程序: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提出假设—验证假设—演绎推理—方法总结。大量的文章和理论著作表明,我们的研究已逐渐由零散之说走上系统的理论建设。另外我们学者已经开始有了建立学派意识。这些都是改革开放以来学术思想的进步。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任务,我们肩负着时代赋予的历史重任,要努力学习前辈的高尚品德,继承发扬他们的优良学术传统,坚决反对学术腐败,维护科学的尊严,净化学术环境,严谨治学,积极创新,把优良学风传递下去,让道德与智慧永放光辉。

杨自俭

2005年4月15日

谨识于中国海洋大学六三居室

国外翻译研究丛书

1. *Constructing Cultures: 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Susan Bassnett &
《文化构建:文学翻译论集》 André Lefevere
2. *Communication Across Cultures: Translation Theory and Contrastive Text Linguistics* Basil Hatim
《跨文化交际:翻译理论与对比篇章语言学》
3. *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 Functionalist Approaches Explained* Christiane Nord
《目的性行为:析功能翻译理论》
4. *The Pragmatics of Translation* Leo Hickey (ed.)
《语用学与翻译》
5.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 Peter Newmark
《翻译问题探讨》
6. *The Science of Translation: Problems and Methods* Wolfram Wilss
《翻译学:问题与方法》
7. *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 Peter Newmark
《翻译教程》
8. *Discourse and the Translator* Basil Hatim & Ian Ma-
《语篇与译者》 son
9. *Language and Culture: Contexts in Translating* Eugene A. Nida
《语言与文化:翻译中的语境》
10.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 Gideon Toury
《描述翻译学及其他》
11. *After Babel: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 George Steiner
《通天塔之后:语言与翻译面面观》
12. *Translation Studies: An Integrated Approach* Mary Snell-Hornby
《翻译研究:综合法》
13. *Deconstruction and Translation* Kathleen Davis
《解构主义与翻译》
14. *Translation in a Postcolonial Context: Early Irish Literature in English Translation* Maria Tymoczko
《后殖民语境中的翻译:爱尔兰早期文学英译》
15. *Translating Cultures: An Introduction for Translators, Interpreters and Mediators* David Katan
《文化翻译:笔译、口译及中介入门》